

1916

佛山



第三期

(1983年12月)

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顺德县委员会文史研究组编

顺 德 文 史

第 三 期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顺德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组 编

1983年12月

顺 德 文 史（第三期）

顺德政协文史资料组编

顺德县印刷厂印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

目 录

容奇解放前夕的回顾

.....杜启芝 (1)

西海抗日三十战

.....黎朝华 (13)

顺德学生抗战初期活动片段

.....罗 风 (20)

回忆三位革命同志

.....陈叙伦 (24)

顺德尤烈简史

.....郭耀昌 (31)

辛亥革命中的梁璧联

.....耀 昌 (42)

苏曼殊祖籍是顺德碧江

.....马以君 (46)

“岭南羽衣女士”考

.....以 君 (48)

陈独漉先生传略

.....龙庆镛 (52)

黄萧养起义初探

.....郭耀昌 (55)

顺德堤围修筑史略

.....区湛泉 (64)

乐从圩的由来

.....叙 伦 (79)

劳村乡早期蔗糖业简况

.....劳满滔 (83)

顺德洪门会的剖析

.....黄 启 (85)

浅谈“凤城八景”

.....余曼陶 (90)

忆解放前本县的几次运动会

.....何耀堃 (93)

我所知道的本县新旧医疗卫生事业简况

.....梁应沅 (94)

陈岩野先生墓门拟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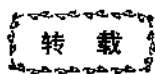
.....龙庆锵 (30)

唐观楹联选辑

.....何锡禹 (12)

一点商榷

.....何家葵 (97)



也谈孙中山先生的“剪辫文告”

——与郭扬、吴慧二同志商榷

.....黄章甫 (98)

容奇解放前夕的回顾

杜启芝

顺德县容奇镇位于西江下游德胜河畔，交通方便，邻近港澳，加上顺德糖厂就在对岸历来工商业发达。解放前，珠江三角洲几个县的“大天二”都在容奇镇开设商号，作为他们走私、投机炒卖和交蔗卖糖的经济阵地，同时也作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活动的据点。其中袁带、屈仁则、潘惠等所开设的“大公行”就是一个典型。此外，传统的容奇桂洲本地工商业者和各封建民族的经济活动，也都以容奇为中心，故当时的容奇在畸形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着各方势力的激烈斗争，是个矛盾交织，情况复杂之地，因而也有利于中共的地下活动。中共珠江地工委机关就设在容奇。我们顺德地区的中共党员，就在地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当时，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工作，既执行“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又要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把秘密与公开、非法与合法的斗争既区别又结合，使群众斗争沿着开辟国统区第二战场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曾先后进行了下列的一些活动：

(一)

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召开伪国大，通过伪宪法后，为了欺骗人民，搞了一个什么“实行乡村自治”，“民选乡镇长”。插手容奇的各派势力，就都想利用这一条，通过所谓“民选”，把容奇镇长这个官职捞到手，以扩大自己在容奇的实力。因此，从1948年底就开始酝酿角逐。我把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向组织汇报后，建议帮助与我方接近的开明绅士关□□当选镇长。后来，党组织经研究认为与其帮助别人当选，倒不如自己上场，所以决定要我出头竞选。初时，我有顾虑，怕容奇镇各方面势力复杂，不易对付，而且国民党基层互相倾轧之风很厉害，易出问题，加上自己没有扮演国民党官员的经验，更无省市官僚做“后台”，难以胜任此“白皮红心”的任务。但组织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革命需要，于是我就接受任务，开始进行竞选活动。

我首先抓紧在容奇潜力较大的士绅关□□、农会会长关□□、商会会长梁□□和教育会长区□□等人，他们出力为我宣传、拉选票。当时我的主要竞选对手是原任镇长韦荫棠，他是容奇著名大户，拥有当地绅商势力。但我方因有党的秘密活动，宣传攻势大，有广泛影响力，而且行使选举权的大部分保代表是由农会和教育会掌握的，因此投票结果，我得百分之八十而当选为容奇镇长，并于1949年头举行了就职典礼。当选为副镇长的有何星行、关文淞、刘觉蛮等三人，他们都是只按月支取薪给而绝不过问镇事的士绅。因革命需要而扮演了“白皮”，镇长就职典礼就不能不按他们那一套搞点排场。于是，除关伯坚等地方耆宿及各界代表人

士参加外，还有中山九区大天二梁正等多人到来祝贺，陈列机枪十多挺。又从大良请来一批官绅。使各派势力看到我们有一定的“来头”而不敢轻举妄动。就职后，我考虑到战后容奇的几任镇长都是绅士或商人，手上很少武装力量，甚至没有武装，所以权势不大。为了革命需要，我决心要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容奇民众自卫大队长”是梁根（花名烟根）。他原是挺三第三支队梁自带的中队长，与容奇的彭鼎（文头鼎）是拜把兄弟，但梁根因为是中山过来的，同容奇地方武装即自卫大队属下的各自卫中队长没有什么渊源。我就利用梁根这个弱点，通过串连鼓动容奇各派系武装势力，就以“地方自治应由当地人充任地方武装长官职务”为理由，呈请“顺德县民众自卫总队”免除梁根之职。不久，“县自卫总队”批准了这个请求，同意由镇长兼任自卫大队长。于是我报经党组织同意，派罗桐当容奇民众自卫大队的大队副，胡茄当副官，大队部就设在镇公所内。另外，还新建立一个大队直属的独立分队，由陈振当队长。当时，大队属下共有八个中队和两个独立分队，另一独立分队则是圩头联保主任的十多人枪。

（二）

我兼任容奇民众自卫大队长后，梁根被我夺去他的职位，对我极为不满，因而梁根、彭鼎就成为我们的敌对势力。但由于力量对比上我方占优势，他们对我无可奈何，所以问题不大。但接着就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接到伪县长通知，说国民党104军医院要迁驻容奇，叫我到县府与该院负责人商量有关事宜。国民党伤兵横行霸道，早已众

所周知。伤兵医院一迁来，容奇肯定从此不得安宁。但区区一个镇公所，又怎能顶得住不让它迁来呢！尽管如此，我经过考虑再三，决定采取强硬态度。于是，我在伪县府对该医院的张院长说：“容奇地方武装派系复杂，茶楼酒馆，赌场烟格，马路乡村，到处是‘枪头突突’的武装人员，经常打斗冲突，死伤从来无法追究，伤兵多是外省人，在容奇语言不通，与当地入接触肯定会引起许多麻烦。你们要来我们当然不能说不可以，但整个医院以及伤兵的安全，地方决不敢负责”。我们这样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果然见效，迫使对方接受了我们所提出的下列三个条件：①院址离开市区，②平时伤兵不许到市区来，只在假日有组织有标志的进入市区，遵守地方秩序，不能携带武器，③医院于上午六时前和下午六时后伤兵不准出院门。于是，我指定当时已空置着而又破旧的容山书院给他们做院址。他们进去以后，我又叫自卫队晚上在容山书院周围经常放冷枪，使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后来，这位张院长曾请我去吃饭，我们也逐步做他们医护人员的工作，做伤兵的工作。到接近解放时，有些伤兵还盗卖枪枝弹药给我们，一些伤愈的还参加了我们的自卫队，组成一个班。包括内外科主任医师在内的一些医护人员，也陆续想脱离医院，我们就答应代找地方，方便他们在当地开业。最后，这家国民党陆军医院终于被迫瓦解，院长本人也几乎是只身逃亡。

但在此期间，梁根、彭鼎他们出于前述的旧怨，经常借机向我方滋事寻衅，我们则抓准其弱点，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曾迫使其鸣炮道歉，摆和头酒，不敢再轻视镇公所。另外，当我获悉梁、彭两人曾积极在容、桂搞洪门会，并请葛兆煌来开坛时，我就亦以帮会形式来对抗他们的封建帮

会，我们搞了一个“十八罗汉”组织，包括容、桂的自卫队、农会、狮子会、武术队等系统当中的十八个人，烧黄纸歃血为盟，誓除地方恶势力。从此，梁根、彭鼎他们也不敢再胡作非为。

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地工委指示我们，要警惕敌人在溃败前夕作垂死挣扎，防止敌人对地方设施的破坏。我就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向各方散播说国民党将要拆迁顺德糖厂。由于顺糖当时有“顺德生命线”之称，所以此举引起很大震动。于是我就乘机召集容、桂的士绅商讨对策，大家决定联合向省有关方面请愿，并发出反对拆迁顺糖宣言及组织各界代表进厂检查，要求住厂的工人密切合作，制止拆迁。这样一搞，就起了防范于未然的作用，国民党想要破坏糖厂就不那么容易了。

1949年七月，伪顺德县长陈骥下台，由原任广州卫戍司令部第二处处长的军统特务罗福耀接替。罗下车伊始，便召集全县各乡镇长、各联防区正副主任、联防大队长、自卫总队长和各自卫大队以及在乡官僚如伍蕃、林小亚、郑君凯等在大良开会三天，议论所谓治安问题。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容奇，便即将会议纪录、提案和决议等文件，全部送交地工委并详细汇报了会议情况，以便于上级党组织更好地掌握敌情动态。

七月的一天，地工委书记黄佳同志通知我到北潮吕子良家，还有李思明同志在场，黄佳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当前形势后，代表党组织宣布由我们三人组成顺德十区工委，李思明当书记，明确今后可按照上级党的指示，由区工委自己安排开展工作。从此结束了党地下工作一直是单线联系的局面，以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十区工委就立

刻分工：吕子良负责组织，李思明负责桂洲，我负责容奇。当时，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为自己的溃退留出后路，因而增派“暂编第一纵队”即所谓“邓鄂部队”来驻防顺德，以维持西江出海通道。伪一纵的防区主要是顺德容桂、杏坛、江门北街沿海，司令部设在容奇，对于我们是威胁很大的，但又无法硬碰，就唯有开展巧妙的统战工作，探明虚实，知己知彼，随机应对。因此，当“暂编一纵”由副司令官夏秀峰率领先头部队来容奇布置防地时，我就在陆羽酒家与他初次见面的过程中，设法摸了一下情况，并夸大容桂杂牌军的复杂情况，要求他们协助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因刚来到一个新防区，人地生疏，也就只好同意了。后来，我们独四分队的同志主动设法与他们司令部警卫连的人混熟，并进一步成立了联合巡查哨，不但共同制订统一的口令，而且又可以随时进出他们的司令部。八月初，“暂一纵”司令邓鄂来容奇，伪县府的各级官僚，县与容桂的各方头目在容奇河边的凤城酒家设宴迎接，我也只好前往参加。因为一则我是镇长，不能不去；二则可以借此探听一下虚实。

同年八月，十区工委接上级通知，要组织各界统战对象，特别是工商界，成立半公开的“支援解放委员会”，为了迎接大军南下做些准备工作。于是，我们就迅速组织了容桂农工商各界共三十多人，在李株园同志的指导下，由吕子良同志主持，在桂洲海尾学校开会，选出区庆芝为支援解放委员会的主任，因为区既是十区教育会长，又是容奇商会的理事，便于联络容桂两商会的大户。会议结束后，我与李思明、李株园共同谈论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心情非常兴奋，直至深夜，才和衣共榻稍眠片刻。

国民党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在国统区疯狂地进行征粮、

征税、征兵。我党就发动和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反三征”的斗争。十区工委对这项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上级党关于对“三征”采取极力“抗、拖、应付”的方针的指示。当时国民党政府由“田赋处”负责征粮，乡镇公所只负责协助；由税务局和所属稽征所负责征税。但征兵却规定要由乡镇公所负责，并由县“团管区”派出“乡队副”驻在各乡镇坐催。名义上各保甲要按时“抽签”应征，实际是按户收“壮丁费”。当时“壮丁”大约是二百港元一名。记得那时我到了七月还没有交壮丁费，后来“团管区”的军官多次来催，我们才征了一个丁，交了二百港元。直到解放时，大约也就是交了那么两名壮丁款去应付应付。

(三)

1949年下半年，十区工委遵照珠江地委关于“坚持容桂据点，保存地方元气，准备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地方，必要时向中山九区转移”的指示，进行各方面工作，尤其注重武装工作，不断从火力和人员质量上加强我们直接掌握的容奇镇民众自卫大队直属独四分队。当时，上佳市单车工会和容奇理发工会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为了必要时能顺利开往中山九区，单车工会还自己动手修好了一条由容奇到中山大黃圃的围垦单车路，并举行了通车典礼。当时容里的五坊乡绿榕庙也是我们的基地，因为党员彭□□负责绿榕庙自卫队的武装，掌握得很好。至于乌泥塘西巷一带山村，则是我的老家所在地，地工委机关就设于此。这里的武装是我直接联系掌握的，由于容里群众基础强固，是我们的后方。但因工作重点在圩头，所以我们的主力也放在圩头。只有北潮我们

的力量稍弱。但这里的统战工作好，区□□是兼北潮联保主任，关铁坚兄弟的武装也经常互有联络。同时，李思明同志在桂洲方面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桂洲外村民众自卫大队大致在我们手上，里村的统战工作有基础，岑□□、岑□□、胡□等都参加了“支援解放委员会”。黄顺泰父子也与我们联系。至于桂洲海尾、细滘、华丰沙等地，都是地下党的老据点，苏明等同志在那里也搞起了武装组织。梁□□、黄□等统战对象也同我们靠得很紧。

1949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广东的反动派乱似一窝蜂，全力搜刮逃命资金。事后我们知道邓鄂已托桂洲“大炮梁”汇出港币十万元，但被“起了尾注”，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只得被迫留下来，与一些政治掮客如小榄黎尚统等人相周旋，见一步行一步。伪县长罗□□也一方面找我们联络联络，准备投机；另一方面却收受了彭鼎、梁根七千元港币，发委彭鼎当容奇镇长，而撤销我的职务。他们带着伪县府的公文来镇公所要我交待，企图混水摸鱼，在动乱中捞一把，并报前仇。但我有了公文后严肃地对来说：“我是民选镇长，县府无权撤我职，只有保代表大会才能撤换我。”把他们顶了回去。鉴于斗争情况复杂，我们就在十月初旬，到了中顺边工委（六月间地工委将顺德县工委与中顺边工委合并）向方群英书记请示工作。当时在座的还有邓永年、梁泰猷同志。他们认为应继续坚持地工委原来的部署。因此，我回到容奇后，首先将圩头的主力队伍，撤入上佳市树德堂，并在那里发动理发工会、单车工会工人和石阁佩泽围农民参加起义队伍，准备随时集结出动。而镇公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适当留下，一方面维持表面局势，联系统战对象，一方面严密监视圩头各派系动态。

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后，小榄黎尚统等人策划了容奇大良于十月十五日搞假解放的鬼把戏。在容奇，由邓鄂出面，戴上“礼”字号部队的臂章，在戏院召集各商店、学校，机关、团体等开大会，宣布容奇解放，命令各处挂五星红旗。彭鼎等人则纠集一批反动武装，扛着机枪，直闯镇公所强行接收。针对他们的阴谋诡计，上级党组织传达了地工委指示，立即由我以大队长名义发出起义通告，宣告容奇镇民众自卫大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地方。当晚，容桂地下工作人员立即出动，并有单车工会、理发工会的会员配合，事先已印制好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布告和其他标语等到处张贴，并同时，我们的队伍马上转移到亭阜至海尾一线，李思明同志则在桂洲将胡庆昌的外村自卫大队和细滘、海尾的武装都集结起来，开到桂洲海尾，防止歹徒狗急跳墙。于是，黎尚统、邓鄂他们苦心策划假解放的把戏，就这样被我们戳穿了。十七日我与李思明接头，他传达了方群英同志转来地工委的指示，要我马上逮捕关□□，并带领队伍渡河与中九兄弟部队会合。于是，我就执行逮捕关葆真的任务。我们几人则与邓永年同志联系好，动员了两岸农民几十艘小艇，在当天晚上将我们容桂十区的武装约二百多人渡过了海尾，到中山仔沙与梁泰猷部队会师。

十月十八日，按照地工委指示，队伍集中整编为“粤湘赣边纵队北江大队”，由我负责。下面三个中队：即细滘、海尾的武装编为第27中队，由苏明、李卓负责；桂洲外村的武装为28中队，由胡庆昌、袁发负责；容奇的武装为29中队由彭铁生、陈振负责。接着，我和李思明接到命令，要马上去地工委报到。因此，部队整训期间，交与吕子良负责，

并临时委派胡庆昌、罗桐为正副大队长，程肇芳、梁科、陈燕山等到队伍中做政治工作。当时北江大队还曾与梁泰猷部队开过联欢晚会，很是热闹。我和李思明迅即赶到中山海洲太平沙，在袁世根家向地工委书记黄佳同志汇报了工作情况后，佳叔要李思明返回部队，留下我参加中山三区、九区各大天二（主要是挺三各支队大队）交枪投诚的会议。会议结束时，他宣布我代表珠江人民武装司令部到中山九区直接与各投诚部队联系，负责收缴武器。我就立即到仔沙部队驻地，带上罗桐和警卫数人前往大黄圃与“民利公司”（挺三）第一支队长潘惠（高佬惠）接触，在谈判中他们愿意尽快列册缴交武器。后来因为地工委已与东江的边纵南部队联系上，叫我带领队伍突入容桂。所以，中山九区收缴武器任务，就改为由郑迪年同志去执行，我们的部队在海尾留驻了两三天，在那里召开了十区支援解放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了支前工作。

十月二十七日前后，珠江人民武装司令部主要领导成员黄佳、参谋郭标、边工委刘云等同志，与梁泰猷部队和我们部队一起突入容桂，分别占领各高地。司令部就设在乌泥塘地工委机关。随后，新派来的珠江地委书记刘向东同志带着警卫班来到司令部，召开各县军管接收会议，并采纳我的建议，定名顺德县的军管机关为“容良地区军管会”，并命我马上印制胸章等标志。

我的部队进入容奇，沿何地岗、大凤山一线设防，直逼邓鄂部队前哨太平社碉楼。容奇的梁根、何伦、何寿等反动分子和桂洲的周掌、严泽等恶霸纷纷逃亡。二十九日，邓鄂派其一名高参举着白旗来我司令部，声称他们早已与广州军管会取得联系，奉命保护地方秩序，等候改编，要求我们部队

后撤，以免引起误会云云。黄佳同志当即向其严正指出：我们是顺德人民的子弟兵，有权解放地方，接管一切国民党机构。前段你们奉广州军管会之命维持地方治安是对的，但今天我们已进入顺德接管地方，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管制，撤退岗哨，集中驻地，将防区交出，我们负责你们的安全和给养。否则，引起误会，你们要负破坏解放的责任。第二天，邓鄂部队的岗哨果然撤走了，我们的队伍即进驻圩头，并奉命派出一个中队与梁泰猷部队一起到大良驻防。我随部队到达大良后，方群英、李株园等同志在伪县府大楼简单地谈了几句，便指示我立即去成立容良地区军管会容奇办事处，由李思明和我负责正副主任。我们就在南环马路几间空铺上挂出军管会容奇办事处招牌，发出军管通告，开始办公，并派出军事代表接管了镇公所、警察所、戏院、码头、民族旅店和各中、小学。还接管了县税局和银行。

不久，珠江地工委改为地委，边纵三团进驻容奇，原设在乌泥塘的地工委机关及干部家属等，也于1949年12月陆续迁到中山石岐。后来，上级指示成立十区区委，李思明和我分任正副书记，吕子良则调大良军管会。当时，我还兼任容奇镇总支书记和镇长。十区各界支援解放委员会则扩大，改为十区支前委员会，由我兼主任委员，发动群众，完成支前任务。后来，南下的解放野战军七七部队到达容奇，包围了邓鄂部队驻地并将其官兵全部缴械，按政策遣散士兵，军官则送广州安置，一大批军械被服留下来给我们保管。在此期间，军管办事处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并及时逮捕和严惩了几起抢劫、掳人勒赎和打单勒索的案件，使革命秩序逐步建立起来，因而曾受到地委的表扬。尤其是及时镇压了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大恶霸冯坤元，以实际行动使容桂绝大多数基